

# 论郑观应的近代化思想

周景晓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思想家,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放弃科举,积极投身于实业,同时关心时政、热心西学,逐渐形成了以工商立国、改良政治体制两大内容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其思想体系中蕴涵有丰富的近代化内容。

## 一、以工商立国为核心的经济近代化思想

郑观应在长期经营与管理近代工商企业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以工商立国为核心内容的经济近代化思想。其基本点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 一、提出了“以商立国”的方针

鸦片战争之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冷静审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并积极探讨富强、救国的道路。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在魏源那里,向西方学习的范围是狭隘的,他所说的“夷之长技”主要是指“战舰、火器”与“养兵、练兵之法”。及至后来的洋务派官僚所发动的洋务运动仍未突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局限。洋务派的“自强”方略,也是主要着眼于发展军事工业。洋务运动后期所进行的办厂、造船、修路等“求富”活动,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利于用兵”,强调国家的军事功能,这最终使洋务运动难以超出学习西洋船炮技艺的有限变革范围,不能发展为全面的经济、政治改革运动。

洋务运动后期,郑观应、王韬等思想家经过二十余年洋务运动的实践和比较,开始突破洋务派“强兵治国”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西方列强造成中国日益贫弱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更重要的是它们依靠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对中国经济掠夺。郑观应说道:“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sup>①</sup>针对这种情况,郑观应指出,要想战胜资本主义列强,与其“习兵战”,“不如习商

战!”<sup>②</sup>,即是说,中国要臻至富强,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才能抵制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

郑观应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模式上,中西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sup>③</sup>,而西方国家正是以商为政才得以强大,并成为控制他国命脉的重要手段。中国却历来遵循“重农抑商”的政策,正如郑观应所说“惟中国不重商务,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sup>④</sup>他力主改变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鲜明地提出了“以商立国”<sup>⑤</sup>的方针。这样,郑观应就把商业摆在了“立国”的高度。他是这样论述商业的巨大作用的,他说:“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具有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sup>⑥</sup>无疑,郑观应在论述商业的巨大作用基础上提出的“以商立国”的方针含有指导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实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进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打开广大富饶的中国市场,但清政府一开始就对西方的贸易冲击采取退缩与封闭的态度,固守着“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郑观应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呐喊正是对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勇敢挑战。

郑观应没有停留在对商业的重要性的论证上,而是进一步呼吁和要求政府设立“商部”,使商部成为中央各部之首。地方应设立“商务局”,由地方公举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商董,保障地方商务的勃兴;各州县工商业者自己组织“商务公所”,处理商务。很明显,郑观应的这些设想已具有可操性的内容。

### 2、论证了工、商业的关系

郑观应认为,要想在“商战”中取胜,又必须依赖于强大的近代化工业做为基础。他指出:“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sup>⑦</sup>具体到工业和商业的关系上,郑观应认为“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

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sup>⑧</sup>，由此看出，郑观应认为工商关系是互为依托，互为因果的。“若有商而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已利以资彼用而已。”<sup>⑨</sup>这里说明了如果没有国家的工业化，那么一切资源宝藏都将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原料基地。总之，郑观应始终把工业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且把工业看作商业的基础，这种观点是高于当时其他一些思想家的。

我们知道，工业化是近代化的核心任务，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能有国家的富强以及政治等其它各方面的近代化。郑观应对于工商关系的阐述正是抓住了近代化这一核心任务。当然，为了振兴商务、对外进行商战，除了要以近代化工业作为基础之外，郑观应还提出了诸如收回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种种护商政策，还主张发展轮船、铁路、电报，以降低流通费用；主张铸造简便的通货和创办银行，以促使交换发展和加速资本周转。我们应该看到，郑观应提出的这些主张和建议，也是和近代化工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的，只有工业发展了，物产丰富了，国家强盛了，这些主张和建议才能更有效地实施。笔者认为，郑观应对工商关系的阐述以及提出的其他主张和建议，一方面反映了他对近代化工业基础地位的特别关注，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他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思考。

### 3、探讨了工商企业的经营形式

郑观应还对工商企业的经营形式做了比较深刻的探讨。起初，郑观应对“官督商办”是持肯定态度的，这是因为：“全恃官办，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sup>⑩</sup>郑观应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国家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官”的作用和影响始终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目标的特性就会必然反映到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来。郑观应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对“官督商办”的经营形式持了肯定态度。

但是，“官督商办”毕竟是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宜之计，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不得已而妥协的产物。随着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弊病渐趋显露出来。诸如官僚机构臃肿，任用私人，营私舞弊，贪污横行，官受其利，商受其害。对此，郑观应严厉地批评道：“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伍，其不贪肥者，遇

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戕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sup>⑪</sup>为此，他提出一个全新的主张，即兴办新式企业，要“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sup>⑫</sup>所谓“商贾之道”，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清政府举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不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按长官意志办事。郑观应提出“商贾之道”，正是希望私人资本得以发展，从而排除夹杂于其中的封建官僚体制，以求得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郑观应的这一认识，反映了新生产阶级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 二、以改良政体为核心的政治近代化思想

郑观应的近代化思想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沿着由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的轨迹而向前发展的。

郑观应在1873年问世的《救时揭要》中，只是谈论禁止鸦片、救灾 贫、兴办工商等问题，还没有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到1875年基本成书的《易言》中，他的视角已伸入政治领域，开始明确地批判封建专制，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并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他写道：“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有可豫期者矣”<sup>⑬</sup>。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仿行西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要求，也是郑观应早期民权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点。随后，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他的议院思想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这主要体现在188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中，其主要点为：

### 1、对议院制的赞美与呼吁

郑观应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局势做了这样的分析：“为主者即各私其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sup>⑭</sup>这实则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专制制度，才使君民之间权力和利益不能均衡，造成对立和社会动乱。由此郑观应得出结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于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sup>⑮</sup>即是说，应把设议院作为国家的“富强之本”。他用赞美的笔触写道：“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sup>⑯</sup>

在赞美议院的同时，郑观应指斥了洋务派把富国强兵仅限于船坚炮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通，果足恃欤！”<sup>⑰</sup>在这里，郑观应从体用哲学范畴出发，指出了

“体”对“用”的决定与制约的作用,洋务派“遗体求用”是主辅、本末关系的颠倒。这在当时是大胆和富于创造性的见解。

郑观应认为,如想富国强兵,与西方列强抗衡,只有设议院才能达此目标,他呼吁道:“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sup>①</sup>

## 2. 设议院可以限制君权,防止腐败

郑观应在《易言》中强调的只是议院之设可使上下通情,君民不隔。而在《盛世危言》中所说的议院则是着眼于对君权的限制、民权的伸张。他说:“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sup>②</sup>“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sup>③</sup>。这些论述已明显地含有伸张民权、三权分立的思想。他还认为议院能够防止官僚腐败,他说:“自有议院,昏暴之君无所施其暴,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sup>④</sup>显然,只有当议院拥有实际权力时,才能保证“昏暴之君无所施其暴”,所以,郑观应所说的议院已不仅仅是君主的咨询机构,而是一个可以限制君权的权力机构。郑观应还曾说过:“夫畏葸也,琐屑也,敷衍也,颛预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不去者也。去之之道奈何?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sup>⑤</sup>这句话同样表达了设立议院可以防治政治腐败的思想,郑观应的这些见解无疑都是非常深刻的。

## 3. 设立议院的紧迫性和可能性

郑观应通过比较民主、君主、君民共主三大系统的政制,得出君主立宪为理想政体的结论,他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sup>⑥</sup>所以他对在中国实行英日式的君主立宪制寄予厚望。他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如果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于坐视彼族超九万里而群逞彼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sup>⑦</sup>表达了他对中国如实行议院制后必将强盛的信心。

甲午战争后,郑观应的议院思想又有所发展。面对空前加剧的民族危机,他已不止于论述在中国设立议院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立刻就在中国实行议会制度的意见。在《答某当道设议院论》一文中,郑观应集中论述了在中国设立议院的紧迫性和可能性。

郑观应认为,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不宜即设”、“风气未开,欲设议院,骇人听闻”、“学校未兴,先开议院,恐易滋事”等看法,都是“寻常之见”。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比之以往更具有设立议院的紧迫性,“若此时不建设,迟至各海疆尽被西人占据,恐欲设而不能。”在设立议院的可能性上,郑观应认为,设立议院的办法可以变通,不一定非要照搬西

方。西方一般是先开学校造就人才再设议院,而中国“学校未开,人才难得”,设议院固然有困难,但可以“因地制宜”,走“先设议院,并开学校”的途径,即变通的途径。郑观应说:“今时急矣!而苦于势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径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sup>⑧</sup>郑观应的“用奇兵以致胜”的变通途径,无疑给“民智未开”、人才难得的中国提供了一条设立议院的新思路。在戊戌变法时期,即使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严复等人也认为中国不能立即开设议院。严复认为“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sup>⑨</sup>梁启超也说:“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sup>⑩</sup>可以看出,郑观应的议院观比起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观点要激进得多。

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学的突破点。因为议院是与民权相联系的,它的实行必然是对君权的限制和削弱,并会改造以“君臣议一”为纪纪的中体。郑观应疾声呼吁议院在中国土地上尽快实现,这在当时,除他之外并无第二人。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激进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封建专制的批判,但封建专制在中国太漫长太顽固,很难透进一缕民主的阳光。在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徐继畲等先进分子开始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表达了对议会制度的朦胧好感。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一般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启动,但洋务派未能突破“师夷制夷”的模式,不敢触动封建政体,清政府仍然是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王韬、马建忠等人虽然介绍了西方议会制度和三权分立学说,间接表达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鄙薄,但还没有直截了当提出要在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让资产阶级直接参与政权。只有到了郑观应这里才由仅仅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赞美上升到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现实思考和实行议会政治的迫切要求。他没有生搬硬套西方模式,也没有屈服于当时流行的所谓中国民智未开不宜速设议院的说法,而是结合现实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设计,这尤为难能可贵。

郑观应一面要求振工商求富裕、一面谋求政治改革的思想,代表了维新变法之前最先进的社会思潮。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郑观应的近代化思想并没能得以实际运作和具体实施,但这并不妨碍其思想本身给予当时社会的巨大冲击以及留给后人的深刻启示。

### 【注】

①②⑥⑧《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588页。

③⑤《盛世危言·商务三》,《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页。(下转第59页)

动改造的方式的滑稽与荒诞。《客气的日本人》记叙了作者被日本兵误以为是某一进步人士而遭受误传与审问的经历。杨绛用简洁的笔默把事件的前因后果梳理得清清楚楚,整篇基本上是由对话和我的行为与心理活动的描写组成。很大篇幅写日本人对我的客气、温文尔雅,最后用李健吾的遭遇和他简短的一句话“获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就把题目给否定了,把日本兵的虚伪与凶残的实质揭示出来。杨绛叙事、记人,笔法朴素,简洁精致,正如杨绛赞其妹妹杨必所言:“她讲一件事,只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sup>⑩</sup>杨绛只用生动的对话和有趣的“情节”描绘,偶尔也对人物的状貌进行细腻的刻划。读过《赵佩荣与强英雄》的都会对门房赵佩荣一接到打给杨府的电话就反复地介绍自己“走肖赵——走肖赵”的可笑举动和“八”的一撇一捺都往下垂的胡子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林奶奶》记北京城里为人帮工的旧式妇女,写出她生活上的节俭与为人的勤劳,也写出她精神上的寂寞与糊涂。杨绛细腻地描写了林奶奶奇特的衣着。在她那虚有其表的大肚皮里,穿着钉着一个又一个大口袋的衣服,口袋里分门别类地装着她的全部家当。读来让人倍感辛酸。杨绛的散文,特别是《杂忆与杂写》的“杂忆”部分,在文体上有很浓的小说成份。

在文体上最能显示杨绛个性的当推她的语言,它显示了杨绛丰富的学识与机敏的情趣。杨绛散文的语言生动形象,但它并非来自词藻的丰富与华美。它来自作者描情状物的准确与独特的联想和比喻。杨绛散文以现代口语为底色,简洁利落,极少华丽的修饰。杨绛往往在平平淡淡的叙述中,面对现实情境,插入比喻和中国古典或者欧化的词语,陡然提高了文化品味,使语言显得活泼新颖或者简洁浑成。

我们怀疑他自愧窝囊,而向往英雄,所以学着浪漫派小说家,对着镜子把自己描绘成英雄,而且像浪漫主义的角色,卖弄自己并没有罪过。

《赵佩荣与强英雄》

(上接第38页)

④《盛世危言·商战下》,《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⑤⑩⑫《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7、609、612页。

⑦《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页。

⑩《盛世危言·开矿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4页。

⑬《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⑭⑮《盛世危言·原君》,《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页。

“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

《丙午丁未年纪事》

阿灵回乡很风光,不再挨打,她简直像旧时代的衣锦还乡或近代的留学回国。

《阿福和阿灵》

杨绛的比喻非同寻常,它带有浓重的书卷气,别具情韵,使人在惊奇中开阔见闻,增加知识。杨绛往往从中西方文学作品中拈来比喻,但又决无“掉书袋”之感。

很显然,杨绛的散文在选材与手法运用上都很平常,不寻常的是她既有一颗有着丰厚的学识与人生智的头脑,又有一颗有着普通人情怀的心。她既能沉入世俗人生之河去体察,更能从中超越。她用智慧的头脑、血肉之躯去感受体味人生,又将这感受化为人生智慧。在杨绛笔下,智慧不是渊博的知识、精深学问的显示,而是对人生的态度,对人间的情怀。从中西方文化和漫长人生岁月中获得的人生智慧的自然流露,便蜕变生成了杨绛的散文。

【注】

①②陈剑晖在1995年第2期《文艺评论》上撰文(论90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认为一些学者散文总是纯叙述性地回忆过去,醉心于往事、古典和传统,而缺少体验,缺少现实的参照和自由开放的现代情怀。

③⑦王晓明等人的《眺望内心深处的日落》,《钟山》1994年第6期。

④海涅论堂吉珂德,转引于杨绛的《堂吉珂德和(唐吉珂德)》,见《杨绛文集》。

⑤《有什么好?》,见《杨绛文集》

⑥⑧分别引自《丙午丁未年纪事》、《记杨必》,见《杨绛文集》。

⑨张明亮《智者的记忆》,《读书》1988年第3期。

(责任编辑 周永祥)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1、314、312、315、313页。

⑰《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⑳《盛世危言·答某当道设议院论》,《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4页。

㉑严复,《中俄交谋论》,《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5页。

㉒梁启超,《古议院论》,《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责任编辑 丁新约)